

制度体系的内在一致性——现代化转型的分析框架

■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

这是我最近在做的一个研究，当然也是一个长期研究项目。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课题？先回顾一下文献，制度体系的内在一致性问题怎么产生？源头是马克思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。我们把制度体系看成一个系统，这个系统内部有一些子系统，子系统之间的结构和子系统之间运行相互作用要求内在一致性。如果发生内在不一致，或者子系统不兼容，就像医学上的器官移植一样，把器官移植到另外一个有机体，这个器官可能存活不下去，可能导致另外一个机体的死亡。马克思已经讲了这个关系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如何相互适应，如何发生矛盾和冲突，他虽然没有明确把社会分成子系统，但实际隐含把社会分成了经济子系统。上层建筑很广泛，包括政治、法律、社会、思想意识等等，上层建筑放在上层建筑里面，非经济部分全放在上层建筑里面。所以，可以把他的分析方法看成是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的作用，就是经济

和上层建筑。
明确提出系统分析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，帕森斯提出的社会学结构功能分析。他之前有社会学家也提出过这个想法，就是把一个社会划分为子系统组成的有机体，而子系统如何划分？帕森斯本人划分了四个子系统，经济、政治、法律、社会组织，最后他又加上了文化。他认为文化是连接子系统的纽带，并且起到提

领着各个子系统的作用。
帕森斯前后的社会学家对于结构功能分析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总体来说这个学派就是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，不是看成一个无生命的物理系统，而是把它看成一个有机体。这个有机体就像人体的血液系统、神经系统、消化系统、呼吸系统等，子系统之间彼此有关联，每个子系统又有自己相对独立性，能够在子系统之内保持运作，同时和其他子系统通过生物学的、神经的、发生和联系。一个思想来源于对有机体的观察。所以，形成两种思路，一个思路就是笛卡尔的，把社会看成一个物理系统，另一个是由生物学角度观察社会，把它看成有机体。

在系统论分析方面，我国学者金观涛、刘青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他们早在几十年前出版了一本书叫做《兴盛与危机》。在这本书里他们把古代中国社会分为三个子系统，观念子系统、政治子系统、经济子系统。这本书后来又再版，我认为这是相当优秀的一本著作。他们用系统论的方法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，为什么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年，从秦一直到清不断地循环；循环过程中，制度方面为什么会出现突破，都在原有水平上的复制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超稳定结构？金观涛、刘青松两位的观点就是，中国古代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非常之紧密，以至于每次把它打破，都按照原有结构复制起来。总的系统中缺乏创新的要素，特别是把中国古代社会和西欧进行比较，能够看到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性、保守性和僵化性；没有新的因素能够在发展过程中打破原有的均衡，每一次王朝的解体都按照过去的记忆，重新复制被打碎的有机体。这是他们两位的贡献。

到了2010年，金观涛又出版一本书叫做《历史的巨镜》，这本书他沿用了《兴盛与危机》中提出的社会分析框架，但这一次他不是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。《历史的巨镜》用系统的分析方法，写为什么西欧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，进入工商文明；在转型过程中，观念的、政治的、经济的子系统如何互动。这是他的系统论。

更进一点的是亨廷顿政治秩序的演进，他没有明确提出系统分析方法，但他对工业化过程中世界各国政治秩序的演进做了案例归纳，归纳的过程实际上也用了子系统之间相互矛盾、相互作用、动态发展过程方法。他提出，在经济领域出现工业化，而工业化产生了新的社会群体，新的社会群体推动贵族政治从传统社会的贵族政治向精英政治转变。工业化过程中出现新阶层，主要是中产阶级。对中产阶级的理解和西方、国内的理解有一些出入，有一些地方的中产阶级包括了资产阶级，我们的理解中产阶级不包括资产阶级。我沿用西方大多数人的说法，中产阶级实际上是包括了资产阶级。中产阶级的产生，工人阶层的产生使得原有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，社会结构变化推动着政治结构的变化，大众政治参与的兴趣，要求世界各国凡是进行了工业化的国家，必须要变革政治体系，因为大众要求。亨廷顿在《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》中讲，工业化速度越快，政治变革越为激烈。亨廷顿在书里感叹，为了保持社会稳定，能不能说工业化慢一点，如果工业化速度太快了，社会变化的烈度有可能无法承受，有可能断裂。

这是对文献做一个回顾。
用系统、子系统相互协调，内在一致性方法分析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转型，我只引用两本著作，一本是摩尔《专制与民主社会的起源》。他分析的也是现代化过程中，现代化的道路如何决定，为什么世界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展现出相当大差异的路径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**摩尔认为是前现代社会的农业社会结构决定了现代化的三条道路。**他的方法就

是用前现代社会的初始状态作为一个主要的因素，分析现代化道路的不同，对我们有启发。但是他的重点落在了农民、农村、农民和地主的关系，这一点我不能同意，我认为决定现代化道路的并不是农村结构，是前现代的政治结构，而不是农村结构。农业社会结构如何决定现代化的三个道路呢？摩尔做了这样的分类，英、法、美三个国家在前工业化时，农业的商品化程度比较高，资产阶级的力量强大，可以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民主制，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路径。德国和日本，资产阶级相对弱小，国家政策走向主要取决于农村各阶层的力量对比，于是就出现了与传统精英合作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变革。

摩尔认为，由于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弱小，在德国主要是容克贵族，在日本主要是封建大名，推进明治维新的封建大名和武士决定了现代化的道路，而这种现代化道路最终走向了法西斯主义。俄国、中国是皇权官僚专制下的农业社会，工商阶层同样虚弱，但它和德日的区别，在于皇权专制推动的现代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和苦难，这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无法支持专制皇权发动的改革，最后通过共产主义领导的工农革命推翻了改革不力的专制皇权。推翻专制皇权之后走上的是另一条斯大林主义的道路，这一条摩尔没有分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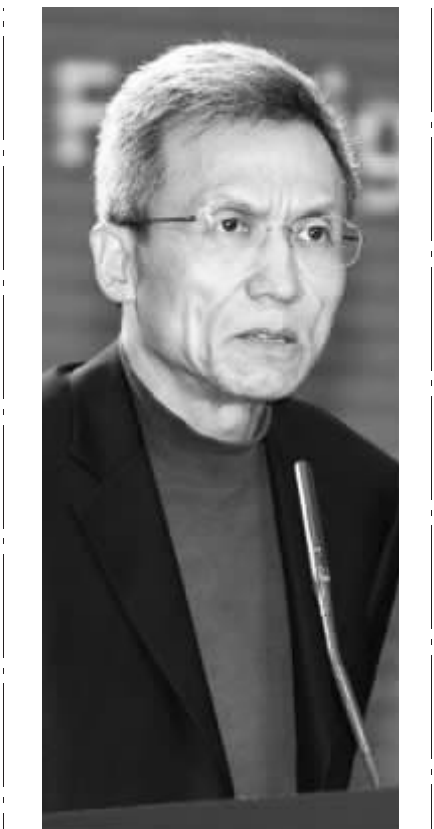
有意思的是摩尔在他的观察中说，现代化的成功与否不能只看经济成功，不能只看经济增长。他说德国和日本在打破封建制之后，曾经经历了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，增长速度超过当时已经工业化的法国、英国和美国，甚至美国南部奴隶制下都出现过经济繁荣。所以他警告，**只关注经济成功作为现代化转型程度标准，有可能会给人类自由带来巨大灾难，这是摩尔见解深刻之处。**今天讲现代化转型，一说都是拉美国家、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、东亚国家，其实一定要包括非常重要的德国、日本以及俄罗斯案例。摩尔在这一点上有独到之处。摩尔之后，加拿大社会学家司考切波写了一本书《国家与社会革命》，研究长期的政治和社会转型，把法国、俄国、中国作比较，原因是这三个国家都经过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暴力革命，方能打碎过去传统的封建结构进入现代社会。德国、日本现代化的启动相对比较平和，没有经过大规模的社会革命。

这是我研究所参考的文献。
这个研究的目的是归纳和总结现代化转型的历史，不是揭示某种必然的规律，因为社会科学演进，社会科学研究，现在习惯叫社会科学的研究。我的观点是某种必然规律不上科学，我们无法用科学的分析方法研究社会，我更愿意讲社会学学科，而不是社会科学。包括经济学在内，我们所认为的社会科学，我认为都不是科学。什么领域可以用科学主义的分析方法，什么领域不能用？凡是以人为研究对象，都没有科学可言，心理学不是科学，政治学不是科学，社会学、经济学都不是科学，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人。人是理性、感性并存的动物，你最多只能分析他理性那一部分，感性那一部分你很难用科学主义的分析方法，所以，我不认为社会演进有某种必然规律的说法，特别是客观的必然规律这样的说法，都是受科学主义影响，都想把人类当做物理系统研究，这主义影响，很多想文科类所犯的错误，没有人文科学。

既然我们不能揭示某种必然的规律，也就不可能先知如般的预言现代化转型的未来道路。我们只能做事后的分析和归纳。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关注的是子系统之间的张力，以及子系统之间张力产生的冲突，这些冲突决定了系统的性质，决定了我们处于某一个阶段。如果把这个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，这个有机体的性质是什么？也就是我为自己设定的研究目标是非常有限的。受到哈耶克《致命的自负》著作的影响，人千万不要犯致命的自负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，所以我设定的目标也是很有限制的。

通过子系统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来研究系统的性质，包括哪些内容呢？一是效率，系统的效率到底怎么样？这个效率是多方位的，主要是经济效率，还有一个是社会治理的效率。效率的重要性在于国际的竞争中，如果一个是低效的，在国际竞争中最终要失败，就像大清帝国鸦片战争打不过英国一样，不是你的资源不够，因为效率太低，不能充分调动资源，不能发展出先进的科技和军事装备，所以鸦片战争要打输。这是效率的含义。还有就是系统的稳定性到底怎么样，而稳定性又取决于系统的包容性和适应性。系统越是能够包容，稳定性就越好，系统越是能够适应外界的变化，稳定性就越好。所以，**研究系统的性质，一是它的效率，一是它的稳定性。**

沿用社会学和一些学者前面做过的研究，我也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，类比有机体虽然不准确，但它能够提供一个解释性的框架。研究的最终是提供一个解释性的框架，很有限，我再强调一下，既不是揭示某种必然规律，也不是预言未来现代化转型的道路，而只是提供一个解释性的框架。在这个解释性的框架下，我们可以研究系统的性质。子系统按功能划分，和社会学的传统一样，当



我们把制度体系看成一个系统，这个系统内部有一些子系统，子系统之间的结构和子系统之间运行相互作用要求内在一致性。如果发生内在不一致，或者子系统不兼容，就像医学上的器官移植一样，把器官移植到另外一个有机体，这个器官可能生存不下去，可能导致另外一个有机体的死亡。

然，它有一定的任意性。但是，由于我们设定的目标比较低，所以这个任意性对于结果没有太大的影响。这个划分不是唯一的，更不是唯一正确的。

下面我介绍一下现代社会的制度体系。当今世界主流是现代社会，其他民族和国家，不管声称自己走什么道路，各种各样的主义全冒出来，但是在现代化这一点上，有意无意的是方向都一样。竞争所决定，在当今世界主要是由效率一样的现代制度决定，你如果没效率，你就在竞争中要被淘汰掉，这个竞争很无情。

现代社会的制度体系，或者叫制度系统，我划成三个部分，和金观涛、刘青松两位划分一样：观念子系统、政治子系统、经济子系统。现代社会的观念子系统，它的核心精神是平等的个人权利与自由；政治子系统是宪政、民主与法治，毫无疑问；经济子系统是市场经济。这是现代社会的三个子系统。这三个子系统之间形成了目的性和工具性的双向耦合，“耦合”是金观涛、刘青松用的语言，把它叫做双向协调也可以，把它叫做双向兼容也可以，我觉得耦合这个词还是不错的。双向耦合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一下三个子系统——观念的、经济的、政治的。三个子系统耦合，三个子系统之间加一个皮带轮，加一个皮带轮表示什么呢？这是把它表示成机械系统了，只是一个比喻，我并不是把它看成一个机械的物理综合体，而是把它看成一个有机体，画这张图只是为了和大家更好的交流，能够使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。

子系统为什么要耦合？原因就在于我们把这三个子系统看成也三个轮子，三个轮子在旋转。三个轮子的旋转由皮带包裹起来，既然用皮带把它包裹起来，三个轮子的转速需要协调一致，三个轮子的转速会出现一些差别，有的快、有的慢，学物理、学工科的就知道会发生什么现象。如果这个轮子转得快，这个轮子转得慢，会出现什么问题？这里的摩擦加剧，摩擦加剧以后就会产生热，会在皮带上产生张力。我们设想一个极端的状况，就是这个轮子转得快，这个轮子不转，最后是什么情况？皮带断裂，这边摩擦太大，发热，使得皮带变脆，甚至融化，最终断裂。一旦断裂，我们就叫做失序，失序以后停摆。所以这三个轮子彼此之间可以转速有一定的差别，但是不能差太多。一个社会的弹性越好，包容性、适应性越好，允许的速度差越大。一个社会的结构越刚性，允许的速度差就越低。所以我想用一张图来表示子系统协调，子系统协调是什么意思。

现代社会为什么是工具和目的的双向耦合，或者叫双向协调？使得现代社会运转了几百年，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它衰落的迹象，也没

有看到现代社会内部要爆发大规模动荡，从而毁掉它的基本社会结构的迹象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就在于它的子系统之间高度的双向耦合，或者高度的双向兼容。

为什么双向兼容？首先，在观念子系统中，现代社会的核心精神是平等的个人权利与自由，所以平等的个人不能接受非自愿的支配性权力，这就要求在政治子系统中一定是宪政民主制。每一个社会都要建立秩序，但是在于现代社会，秩序必须的支配性权力只能来自全体同意。全体同意的规则，不是全体同意的结果，不是投票的结果，而是投票的程序，全体同意的规则就是法律。所以，在观念子系统中，如果设定了平等的个人权利，在政治子系统中必然是法治，必然是宪政民主。双向耦合就是可以从政治回到观念，反过来，只有宪政民主制才能保护平等的个人权利。从目的性讲，为了实现平等个人权利的目的，我们要求宪政民主，从工具性角度讲，只有宪政民主能够保障平等的个人权利，这就是双向耦合的含义。

对于经济子系统，平等的个人权利要求自由市场，要求经济机会的平等，不能同意强制性的计划经济，因为强制性的计划经济是侵犯个人权利。他也不能同意管制的经济，自由市场中管制是可以的，管制必须经过个人的同意。所以他允许在经济子系统中由政府管制，但是一定是在法治基础下的政府管制，而不是政府超然的进行干预。同样，只有自由市场经济子系统才能够保证平等的个人权利，它全都是双向耦合。只有在自由市场中，人获得经济上的独立，他才能够追求个人的自由，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市场是工具性的，又是目的性的，因为他不能够允许任何外部强加的限制他个人权利的措施、政策。

这个体系还有一个特点，除了双向耦合之外，就是效率。从子系统耦合，我们分析现代社会的效率和稳定性。这个系统为所有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和公平的博弈规则，这个社会具有稳定性。中国人讲不平则鸣，平则不鸣。平则不鸣，就是社会成员对社会制度体系认同程度高，他认为是公平的。博弈规则的结果他不一定都同意，但博弈规则他是同意的，所以他接受在这个博弈规则之下的结果，他必须接受，大家认同。这样的规则经过了全体同意，社会没有在规则上发生冲突。革命是什么？革命就是改变规则，大家都不想去改变规则，为什么？因为规则我们都同意，干嘛去改变规则？所以现代社会中很少有革命，很少有能够称得上是革命的事件。

平等机会意味着社会的流动性，机会均等，你也有机会，我也有机会。破坏稳定不是收入分配不均，皮凯蒂写《21世纪资本论》，整个方法论都是错了，社会公平不公平，不在于财富的分配收入的分配，社会公平在于机会的分配，他把题目搞错了。在美国凯恩斯主义大力鼓吹下，现在皮凯蒂成了名人，言必称皮凯蒂。现在的大众媒体和流行思潮把人们说得是非的分配，他必须接受，大家认同。这样的规则经过了全体同意，社会没有在规则上发生冲突。革命是什么？革命就是改变规则，大家都不想去改变规则，为什么？因为规则我们都同意，干嘛去改变规则？所以现代社会中很少有革命，很少有能够称得上是革命的事件。

现代社会的稳定还因为民主与法治防止了权力的集中，抑制了破坏稳定的极端主义。在世界上破坏稳定，在国内破坏稳定的，并不是权力分散、意见的不同，而是高度一致的社会意识和高度集中的权力，那才是破坏稳定的。现代社会保障了个人权利，为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双重激励，体现在两个方面，一方面是社会精英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通过争夺政治权力获得利益，现代社会建立的激励机制把人们的精力和时间导向创造财富、创新研究、经营实业，在人力资本流动上导向创造财富。另一方面，法治降低了交易成本，提高了市场经济的效率。

法治化的自由市场经济，它的效率一是激励机制导向市场创造，二是鼓励创新。工业革命以来的财富创造，如果做定量分析，我相信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工人阶级的劳动，大部分来自于创新。比尔盖茨为什么是亿万富翁？而微软的软件工程师每年也就是二三十万美元收入，你觉得不公平吗？他反映了财富创造的贡献不同。微软的员工，一千万人放在这，他还是写程序的，没有比尔盖茨，出不来Windows，这就是财富创造贡献上不一样。因此，决定了收入分配的不一样。皮凯蒂要去征收资本税，你要打击比尔盖茨，你要打击扎克伯格，打的结果是没有Windows，没有Facebook，反正中国怎么也没有Facebook。标普把中国主权债评级调到负面，楼部长说我们不在意。其实我们真的不在意吗？我们每天都在用他们创新出来的技术，实际上你是看重的。在市场经济效率的基础上，我们可以进行帕累托改进收入分配，这样可以弱化社会矛盾。皮凯蒂号称学经济，帕累托改进、希克斯改进他都没有概念，不知道他经济是怎么学的，还是哈佛毕业的。这些概念没有，你谈什么社会公平？我想问皮凯蒂，这个世界上你是宁可让比尔盖茨成为亿万富翁，而你可以用Windows，还是你非要收入平均分配，而没有Windows，你要哪个？你都想要，你说我既想要

Windows，又想要收入平均分配，对不起，中国人早就说了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你挑一个，哪个更好？任何人都不能做出理性的选择。

现代社会的稳定性不仅体现在效率上，效率提高就有更多的增量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帕累托改进的收入分配，从而弱化利益冲突，维持社会稳定。即使没有帕累托改进，还可以有制度化的收入分配调整，避免动荡与革命。政治是干什么的？政治就是调整利益分配的，有制度化的收入分配机制，不必通过修改游戏规则，不必通过分配机制和革命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。因此，**现代社会的特点：第一是高效率的，第二是稳定的。**

形成现代社会的前提条件是什么？这一点经常被国内的研究者和国内民众所忽视。这里要介绍一些经济学的概念，经济学只是一个分析的手段，它不能提供预测的工具。形成现代社会的条件首先是多元利益，在多元利益中没有一方是具有支配性的力量，但凡有一方具有支配性的力量，就没有办法达到纳什均衡。多元利益之间，每一个利益共同体都没有办法压倒对方，而只能在不同利益体之间，就博弈规则形成一致意见，这个时候才可能出现现代社会的条件。博弈只能均衡的条件下，现代社会才可能出现。纳什均衡是自我实现的稳态，不需要超然暴力的维持，而当社会博弈处于纳什均衡的时候，这一点上的博弈规则就是法律。什么是法律？法律就是纳什均衡这一点上的博弈规则，由博弈各方所共同同意，由各方同意的博弈规则就是法律，再加上公共道德规范。这里的法律我用的是狭义的定义。

而规则的实质是什么？**美国日裔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明确地提出所谓制度是什么？制度并不是纸上写的条文，制度必须转化为社会的共有信念，所谓共有信念就是一致的预期，这个时候制度才最终被确立起来。**所以，制度不在本本上，不在书里，制度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。举个例子，《交通法》写得清清楚楚，但是为什么大街上遍地都是违反交通规则的人，法为什么不管用？更别说《宪法》。为什么法和现实差那么多呢？因为青木昌彦讲，纸上的条文还没有转化成社会所有成员的共有信念。没有转化成社会成员的共有信念，规则就有可能被违反、被打破，因为违反规则可以获得超额利润。我们到红灯面前都要停下来，但是有些人就是闯红灯，他为什么闯红灯？他比你节约时间，你们都停下来，正好他冲过去了。这在博弈论中叫做“流氓的优势”，就是靠修改规则、靠违反规则，在博弈中获得超额利润。当我们在十字路口看到闯红灯的人太多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也冲过去了。因为当君子是有劣势的，当流氓是有优势的，当君子看到流氓太多的时候，君子也变成流氓了。因为他遵守规则，他吃亏，谁老实谁吃亏。

《交通法》真正作为一项制度建立起来，是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理性的认识，就是如果大家都要闯红灯，结局是每个人在道路上花费的时间都比以前多了，最终我们集体的理性会克服个人的理性。集体理性和个人理性之间的矛盾，奥尔森的《集体决策的逻辑》讲得非常清楚。青木昌彦强调规则、制度并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，而是转化为所有人共有信念的时候，制度才建立起来，也就是要在社会上形成一致预期，也就是才能建立起来。所以，制度的真正建立在于一致预期的形成，这也是制度变革，现代化转型最为困难的地方。这个困难我们把它叫做囚徒困境，是博弈论中讲的囚徒困境。

现代社会转型之难，难在两点。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，有两点非常困难，都在于改变一致预期，改变传统社会中的共有信念，这非常困难。**第一，在传统社会中形成了纳什均衡，这个纳什均衡的规则已经在长期的过程中内化为绝对价值，已经内化为道德规范，人们不想改革它，人们认为改革这样的道德规范是天然的错误。**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的概念，很重要的概念是“孝”。“孝”这个概念不是天生的，谁说人生下来就要行孝呢？这是儒家提倡的，他说为什么要孝呢？父母养你这么大了，你当然得要回报。西晋的竹林七贤之一嵇康说，我为什么要孝？我父母养我，我是他们情欲的偶然结果，我干嘛要负上这个道德的负担呢？他们只是情欲尔，才有了我，我欠什么债？我不欠他们债，我为什么要孝？所以孝这个概念是历史的，由于几千年社会规范的形成，已经内化成为人们的道德，一旦内化为绝对的道德，人们就认为它天然合理，是不能改变的。现代社会中根本没有“孝”的概念。美国子女长大以后，哪有孝不孝？他根本不管，父母对儿女责任就到十八岁以后，赶去家门，等儿女大学毕业，挣钱了，什么给家里钱？我自己花还不够了，没有孝的概念。但是，中国传统社会孝已经内化为道德，内化为社会规范，要改非常困难。今天我们中国社会中谁敢跳起来说反对“孝”？我们连西晋时候的自由知识分子还不如，因为你的孝，到政治体系中就成忠，忠是从孝来的。**现代社会之困难，困难就在于共有信念改变之困难，共有信念改变之困难就在于过去实际上是工具性的博弈规则，现在已经内化为绝对价值。**（下转 04 版）